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容器隐喻、群际态度和助人倾向

作者：孟乐 叶灿 王佳佳 张积家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本研究通过 3 个实验探讨内藏班学生在加工国内民族和国外民族时的容器效应、民族名称与情绪词之间的关系以及被试对不同民族个体的助人行为。研究选题为当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和热点问题。然而，尚有部分问题与作者讨论，具体如下：

意见 1：实验 1 中作者评定了国内和国外两组人名间在熟悉性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但是，国内和国外人名中，又包含了不同的亚类别，比如国内民族包括藏族、汉族、维吾尔族、满族和蒙古族。那么，被试对国内不同民族姓名的熟悉性、典型性、字数和笔画数等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呢？类似地，国外人名中不同国家的人名是否存在类似的差异。这种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是否会导致部分项目的结果与其它项目的结果不同。

回应：(1)关于国内不同民族人名：对国内不同民族人名的熟悉性、典型性、字数和笔画数进行统计。具体如下：在实验 1 中，国内人名 15 个，藏族、汉族、维吾尔族人名 4 个(共 12 个)，计为 3 组民族人名。其余 3 个人名，既可作满名，也可作蒙古名。比如“巴图”，有些文献把它定义为蒙古族人名，意为“强壮”，但有些满族人也叫“巴图”；再比如“海兰珠”，很多人认为是满族人名，但历史剧中出现的“海兰珠”原型却是蒙古族(吴春娟，2004)。究其缘由，是因为满蒙历史渊源颇深，尤其是清朝满蒙联姻带来的文化融合更甚(徐斯日古冷，2014)。对非满族、非蒙古族且对两民族均没有深入了解的个体来说，很难将这几个名字对应为蒙古族或满族。因此，将这三个名字(巴图、索伦图、海兰珠)计为 1 组民族人名。随后，对 4 组国内民族人名的熟悉度、典型性、字数和笔画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4 组民族人名的熟悉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F(3, 14) = 2.75, p > 0.05$ ；典型性不存在显著差异， $F(3, 14) = 1.52, p > 0.05$ ；字数不存在显著差异， $F(3, 14) = 2.55, p > 0.05$ ；笔画数不存在显著差异， $F(3, 14) = 1.57, p > 0.05$ 。

(2)关于国外民族人名：首先，受欧洲文化、历史渊源等影响，实验 1 选择国外民族人名在国外几个民族间是通用的。其次，实验 1 中国外民族人名全部为音译汉语，所以很难将翻译过来的名字对应到某个特定国家。因此，实验 1 的国外人名同质，其最大特征就是表征个体归属于国外民族。一般

说来，被试看到国外民族人名，最直观的感受是外国人名，搞不清楚人名到底属于哪个特定民族，但对实验目的而言，有这一点就够了。我们也查阅了相关资料，弄清楚为什么很多人名在不同西方民族都是流行的？这要追溯西方人名的来源：①圣经。比如，人名“玛丽”(Mary)来源于圣母玛利亚。最初是希腊文拉丁化之后的 Mariam，在希伯来语中是 Miryam。玛丽在各种西方语言中有起码一两百种变种，如法语 Marie，德语 Mia。②神话。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占非常可观的份额，说明对欧洲文化影响之深。比如，英语的 Helen(昵称 Ella)，拉丁语系各语言里面的 Elene, Elena/e(伊莲，伊莲娜/妮)，斯拉夫语里的 Yelena(叶琳娜)，都是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宙斯的女儿。③古名。英语名字里面很多都是古日耳曼名的变体，古希腊/罗马名也有不少。

参考文献和参考资料：

吴春娟.(2004).试析满族人名与文化. *满语研究*, (01), 107-110.

徐斯日古冷.(2014).蒙古族人名变迁的民族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北民族大学)

果壳：西方常见人名小溯源 其实都是一回事(https://www.guancha.cn/culture/2014_01_08_198249.shtml)

意见 2：实验 1 中的呈现位置不仅仅有圈内和圈外两种，还包括了 4 种不同的位置。根据概念隐喻的相关研究，右侧和上与积极相联系，左侧与下与消极相联系。而根据自我优势效应，与自我或自我群体相关的刺激与积极相联系。为考察 4 种位置的影响，实验 1 的数据分析建议作者考虑把 4 种位置纳入作为一个自变量。

回应：在实验之初，考虑过圆圈位置的影响，也想将位置加入自变量，但考虑到实验目的是考察被试对国内民族成员和国外民族成员是否存在圈内人和圈外人的认知结构，研究重点是圈内、圈外效应，所以，就放弃了对位置的考察。为了尽可能避免位置对结果的影响，平衡了圆圈出现在不同位置的机率，使圆圈在上、下、左、右 4 种位置上出现的机率相当。这样，即使位置有影响，但由于位置对国内民族人名和国外民族人名的影响一致，就有效地抵消了。因此，在修改时，并未将位置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为了免去审稿人的疑虑，我们对位置变量进行了分析。在实验 1 中，如果位置有影响，必然存在 4(位置：上/下/左/右)×2 (人名类型：国内民族人名/国外民族人名)的效应，即实验 1 中的人名判断结果受位置影响。方差分析发现，人名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46) = 0.39, p = 0.53$ ；位置的主效应不显著， $F(3, 138) = 1.48, p = 0.22$ ；人名类型与位置交互作用不显著， $F(3, 138) = 1.10, p = 0.35$ 。这说明，位置未对人名判断产生影响。即，实验 1 测得的效应确实反映了被试对国内民族成员和国外民族成员是否存在圈内人和圈外人的认知结构，而不是由“右侧和上与积极相联系，左侧与下与消极相联系”引起的单纯位置效应。

所以没有出现位置效应，一种可能解释是因为实验 1 中材料选择导致，被试看到典型的国内、国外人名时，直接的语义激活就是国内、圈外区分，更为复杂的积极、消极群体评价和群际态度激活则需要更深层次的语义加工。

意见 3：实验 1 中每个人名出现 8 次，是否存在练习效应呢？

回应：首先，为什么设置每个人名出现 8 次？在实验 1 中，人名呈现次数受制于圆圈出现位置，为去除位置影响，只能将每个目标词与 8 种位置对应(人名与圆圈的位置有 8 种组合：人名在圆圈内偏上、偏下、偏左、偏右处，人名在圆圈外偏上、偏下、偏左、偏右处)，因此存在每个人名出现 8 次的问题。其次，将实验 1 中三个区间(实验中安排休息了两次)作为自变量加入数据分析过程，进行 2(人名类型：国内民族人名/国外民族人名) \times 2(呈现位置：圈内、圈外) \times 3(区间：1/2/3)的三因素方差分析。如果存在练习效应，那么，3 个区间的反应时应该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发现，区间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92) = 0.40, p = 0.67$ ；人名类型与区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92) = 2.17, p = 0.15$ ；呈现位置与区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92) = 2.88, p = 0.09$ ；人名类型、呈现位置和区间三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92) = 0.18, p = 0.84$ 。

意见 4：实验 1 中，人名有 30 个，非人名为 15 个，那么被试的判断中只有三分之一为否，这岂不是引入了额外变量，即习惯性地进行是反应？

回应：没有采用等量的非人名填充，主要是考虑到实验时长问题。为避免实验时间过长，减少了非人名填充。在实验后，询问被试是否感觉到人名多，非人名少，且对判断有影响。大部分被试回答，由于早年在藏区农村生活、在内地读书又长期住宿，计算机技术非常不熟练，实验试次出现很快，来不及思考人名和非人名比例，仅关注每个试次。因此，被试受到人名与非人名之间数量差异影响的可能性不大。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以后在研究中应该重视此类问题。

意见 5：实验 2 中的民族名字的字数并不相同，是否会影响实验结果？

回应：实验 2 材料评定中考虑到这个问题。对两组民族名称字数比较，发现国内民族名称的字数($M = 2.86$)与国外民族名称($M = 3.20$)差异不显著， $t = -1.39, p > 0.05$ (原文中已注明)。

意见 6：实验 2 中，民族和积极词和消极词的对应是否考虑到人们对某些民族的刻板印象？比如，鄂伦春族—勇敢。

回应：(1)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民族和国外民族的情感态度(积极或消极)本质上就是由不同民族群体的刻板印象引发的。实验2通过启动的 Stroop 范式考察内藏班高中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态度。按照“双刃剑”模型(Double-Edged Knife Model)，内隐刻板印象一旦被激活，会抑制与其冲突信息的加工(反应时长，错误率高)，促进与其一致信息的加工(反应时短，错误率低)(Dijksterhuis & Van, 1996)。以国内民族名称和国外民族名称作为启动词，就是要触发被试对不同民族的内隐刻板印象。(2)事先考虑到被试对不同民族的熟悉度可能影响实验结果，因此匹配了国内民族名称和国外民族名称的熟悉度。结果表明，国内民族名称的熟悉性($M = 4.18$)与国外民族名称($M = 3.76$)差异不显著， $t = 1.59$ ， $p > 0.05$ 。

意见7：实验1和实验2间的联系是什么？以及实验1-2与实验3的关系是什么呢？实验1发现了容器效应。实验2是内隐联想测验。实验3是助人范式。三者范式不同，测试内容也不同。也看不出，实验2和实验3的效应是由于实验1的容器效应导致的。所以三个实验间是独立的吗？

回应：本研究的设计立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结构。实验1、实验2和实验3分别对应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倾向。从这一角度来说，3个实验相对独立，3个实验分别对应于知、情、意，与直接的递进关系有区别。但3个实验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递进关系。即：首先探查内藏班高中生是否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是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容器图式？进一步，如果被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容器图式，就应该对国内民族产生一种拟亲缘情感；最后，如果被试在认知上对国内外民族存在着容器隐喻，在情感上对国内民族产生了拟亲缘情感，就会产生内群体和谐的动机，就会对国内民族产生更强的助人行为倾向。

意见8：实验3中金钱帮助和时间帮助的人名是否进行了平衡？如果没有，人名不同是否会引入无关变量干扰实验结果？

回应：(1)实验3中人名设置为：①金钱任务：国内民族人名2个：海兰珠和苏和泰；国外民族人名2个：杰克和琼斯；②时间任务：国内民族人名2个：古丽和阿里木；国外民族人名2个：琳达和乔治。(2)分别对金钱和时间助人任务下国内民族、国外民族的2个不同人名构成的问卷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没有发现不同人名造成的显著差异。具体结果：(1)金钱任务-国内民族下， $t(318) = 0.70$ ， $p = 0.49$ ；(2)金钱任务-国外民族下， $t(318) = 1.57$ ， $p = 0.12$ ；(3)时间任务-国内民族下， $t(318) = 0.11$ ， $p = 0.92$ ；(4)时间任务-国外民族下， $t(318) = 0.19$ ， $p = 0.85$ 。

意见 9：实验 2 和 3 的结果发现人们对本民族有更积极的联系和更多的助人行为。这类结果已经被以往大量研究所证实。那么本文的创新性或独特的价值体现在何处？

回应：虽然被试对本民族具有更积极的情感和更多的助人行为已有很多证据，但研究对象还仅局限在本民族层面，针对包摄水平更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极少。从本质上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复合群体来说，是否存在类似于单一民族的积极情感态度和助人行为倾向，尚未有研究。实验 2 和实验 3 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研究对象，以实验范式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深入理解其内涵提供了实证证据。

意见 10：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而本文探讨的是民族词汇的容器效应、与情绪词的内隐联系和与助人行为的联系，这些内容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相比还比较单薄。

回应：诚如审稿专家所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宏大且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话语构建工作是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之一，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性作用尤为显著(郝亚明，2021)。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以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结构为基础。

然而，目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结构研究还较薄弱。这是摆在心理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结合以往研究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我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思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由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共同建构的：在与国外民族比较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容器认知结构凸显；在中华民族共同内部，即在同一“容器”内部，又存在差序格局。本文以与国内民族、国外民族为比较对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探索，得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容器认知模式，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进路。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丰富，但从研究角度看，还是要将其内涵具体化，具体为一些可操作和可量化的指标，容器隐喻、共同内群体偏爱、共同群体利他行为正是这样一些可操作和可量化的指标。

参见文献：

郝亚明.(202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待多学科共创理论话语体系. *民族学刊*, 72, 9-14.

张积家, 冯晓慧.(2021).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心理建构与影响因素. *民族教育研究*, (02), 5-14.

其它细节问题:

问题 1: 具身认知(Embodied 以 Cognition)应改为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工作, 将具身认知(Embodied 以 Cognition)修改为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

问题 2: 实验 2 中的民族名称是否合适? 例如, 一般我们称为丹麦人、芬兰人、冰岛人、波兰人。再如伊朗族, 好像这个称谓并不合适, 伊朗的人口中又包含了波斯人, 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等不同民族。所以, 实验 2 中的民族名称是否合适? 以及是否会给被试带来困扰?

回应: 诚如专家所言, 伊朗族叫法存在不太合规范之处。但的确存在这样的表达。如 360 百科在介绍时有“斯基泰人属于伊朗族的塞人”。介绍乌孙人时说他们“属于东伊朗族”。实验之初我们也考虑过这一问题。按照设想, 寻找一些国外民族名称, 比如芬兰族包含的科米族、卡累利阿族、乌德穆尔特族等, 但这些名称又带来了熟悉性问题。内藏班高中生在藏区长大的青少年时才有机会来内地, 对国外具体民族知之甚少。如果选择一些国外特定民族, 被试会不熟悉。为规避这一无关变量, 只能选择既能明确表征国外民族又有一定熟悉度的名称, 被试一看就知道是国外民族。因此, 我们认为不会对被试造成困扰。

问题 3: 实验 3 在选择故事主人公名字的时候是否考虑到某些人名可能与电视剧或电影中的主人公重名等因素, 进而引起被试不必要的联想(如海兰珠在某些影视作品中的人设), 进而影响到助人行为呢?

回应: 如前面第 8 条回应, 我们认为这一因素没有引起显著的影响。

问题 4: 马克斯·韦伯等国外学者的名字建议用英文。

回应: 按照审稿专家的建议, 将国外学者的名称修改为英文, 具体为“Weber”。

问题 5: 因部分被试未成年, 实验的进行是否征得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

回应: 实验在内地学校完成, 没有联系学生家长, 但实验材料、程序等经由所在学校同意。

.....

审稿人 2 意见：

本文运用了 Stroop 范式及改编的金钱和时间的助人决策情境任务，设计 3 个实验，探讨了内藏班高中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理结构。本研究的选题有新意，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方法合理，写作规范。有几个问题与作者探讨。

意见 1：国内民族人名取自藏族、汉族、维吾尔族、满族和蒙古族，请问作者这个取法的标准是什么？还是随机的？维吾尔与满族的一些人名会不会让被试觉得与国外人名差不多？是否有预实验结果表明被试能更好区分两类人名？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1)国内民族人名主要选择一些大的民族、熟悉性高的人名。这样，使被试看到人名，立刻想到这个人名归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因为熟悉性限制，没有选择一些小民族人名。(2)为避免被试对两类民族人名混淆，事先进行了人名的典型性评定。结果发现，两类人名的典型性都很高，且不存在显著差异。国内民族人名的典型性($M = 4.45$)与国外民族人名($M = 4.68$)无显著差异， $t = -1.00$ ， $p > 0.05$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可能存在区分混淆的问题。实验事后询问也显示，被试能够区分国内民族人名和国外民族人名。

意见 2：实验 1 的结果分析中，是否可以考虑对圆圈内外偏上、偏下、偏左、偏右处不同位置的人名的数据进行分析？圈内或圈外不同位置是否有差异，这些差异是否还有其他意义呢？

回应：同对审稿专家 1 的第 2 条意见的回应。

意见 3：本文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结构界定为“认知”、“情感”与“行为表现”三大方面，实证结果也与此构想一致。审稿人想与作者探讨，现在提出的三方面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结构，如何深入理解每一结构的内涵。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由容器隐喻和差序格局共同建构：与国外民族比较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容器认知结构凸显；在中华民族体内部，又存在不同的差序圈层。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理论。差序格局是表示个体人际关系亲疏的模型。以群际接触对差序圈层的影响为例，个体的本民族身份认同应当处于圈层核心，那么本民族、接触多的民族、接触较多的民族、接触少的民族依次从圈层核心向外延申，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对各民族的熟悉程度、亲密程度、积极情感、利他动机等也逐渐降低。从容器隐喻到差序格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模型的进一步探索。

意见 4: 根据本文的研究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否可能随着全人类交往范围的扩大,最终会完全消除各种族间的偏见与刻板印象?请教作者如何理解这一问题。作者在讨论中也提出了“如何处理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

回应: 首先,因为差异,文化之间交流和互鉴才有意义。但另一方面,不可改变地保持差异,也绝对不是人类文化总体的特征之所在。一种彼此之间基于和谐而非冲突的交流,各种文化能够在交流之中得到各自的成长,这是人类去构建社会的真正目的所在(赵旭东, 2019)。提倡“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建的。因此,在“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下,各民族间的独特文化、风俗习惯、价值体系等都被尊重和保护。其次,只要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存在,偏见或刻板印象就不会消失。社会身份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均认为,在社会情境中,人们会自动地对人群贴上内、外群体标签——“我们”和“他们”(社会分类),并比较内、外群体的社会地位、名声等(社会比较),构造对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从而获得明确的社会认同。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社会情境中,社会比较和社会分类总会发生。因此,随着全人类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只能尽可能地降低个体对他社会和他文化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不断走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如何处理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从宏观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任务都极为重要。一方面,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要谋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中华民族一直憧憬建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讲求“天下一家”和“天下大同”,主张“民胞物与”和“协和万邦”(金刚,子央, 2020)。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从微观心理结构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表现在与国外民族比较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容器图式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内的各个国家与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类似,依据利益集团、外交盟约、文化渊源等因素,由内向外延申,其内群体偏好性、熟悉度、亲密度、积极情感和利他及互惠动机等逐渐降低。对中国人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圈层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管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本质上都是一种独特的群体自我。从这一角度来说,应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放在前列,先建立其有关中华民族、中国人的稳定自我,才能够以坚定姿态,放眼世界,以人类发展为己任,去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参考文献:

赵旭东.(2019).迈向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一带一路”人类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新思考. *西北民族研究*, (02), 27-39.

金刚, 子央.(2020).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03), 16-21.

意见 5: 能否把结论表述得更加具体些, 目前的表述显得不够具体。

回应: 按照审稿专家的意见, 修改了本文的结论部分, 使之更具体。具体如下: “在认知上, 内藏班高中生建构了容器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 国内民族成员处于容器内, 国外民族成员处于容器外; 在情感态度上, 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民族存在着内群体偏爱, 对国外民族存在着外群体偏见; 在行为倾向上, 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民族成员有更强的助人意愿。”

意见 6: P3 有个小拼写错误: ““Embodied 以 Cognition”。

回应: 文中已做修改。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经过作者的认真修改, 本文质量得以进一步提升。但是, 尚有部分问题与作者讨论, 具体如下:

意见 1: 本文的三个实验分别探讨了内藏班学生加工民族名称时的容器效应、民族名称与情绪词之间的内隐联系以及被试对不同民族的助人行为。上述研究仅有第一个实验是聚焦于容器隐喻, 因此目前的题目(即容器隐喻的视角)有些不确切。而且, 三个实验的着眼点比较微观, 作者的题目和整篇文章的基调比较宏观(即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选题很重要, 也是当前的社会热点。但是, 目前的三个行为实验较难支持如此宏大的题目和立论。建议作者着眼于三个实验的研究发现, 聚焦具体研究内容, 修改论文题目和正文, 将全文表达聚焦于三个实验研究本身, 适度升华研究内容。

回应: 对题目和正文进行了修改。1.对题目的修改: (1)去掉“容器隐喻的视角”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结构”; (2)聚焦三个具体实验, 修改为“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容器隐喻、内隐态度和助人倾向”。2.对正文的修改: (1)在正文中, 删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内容; (2)在前言中, 注重对具体实验的介绍; (3)在讨论中, 将三个实验的结果作为主要讨论内容; (4)将具身认知和文化塑造作为讨论的延伸部分。

意见 2：建议作者在初次介绍具身认知和隐喻等相关理论的时候，适当多地考虑国外开创者的经典研究和贡献，并引用、介绍其相关文献和发现。

回应：按照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以下修改：1. 关于隐喻：(1)理论部分介绍，主要引用 Lakof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所提出的关于概念隐喻的观点；(2)虽然隐喻实验较多，但容器隐喻的相关实验研究还较少，目前文中已经引用了较为全面的国内外容器实验结果。2. 关于具身认知：引用早期阐释和最重要的相关实验发现(“镜像神经元”)等内容，作为理论介绍。

意见 3：实验 1 中，人名有 30 个（是判断），非人名为 15 个（否判断）。这种判断的不平衡会干扰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建议作者在讨论中明确指出该设计的不足和缺陷，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回应：在文末处，明确指明该设计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意见 4：实验 1 发现了民族名称的隐喻容器效应，实验 2 发现了民族名称与情绪词的联系，实验 3 揭示了民族名称与助人行为的关系。作者虽然指出实验 1、实验 2 和实验 3 分别对应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倾向。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宏观层面对三个实验进行整合。建议作者进一步思考三个实验的联系，修改相关表述。请着眼于每个实验具体发现了什么，进而介绍三个实验间的内在联系。

回应：从具体实验发现角度，进一步梳理了三个实验之间的关系。文中的介绍，以内群体认知对群际态度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这一逻辑来勾连具体实验。实验 1 探讨在容器图式上建构起来的共同内群体认知；实验 2 建立在共同内群体认知导致共同内群体偏爱基础上，从认知过度到情感态度；实验 3 建立在认知和情感态度基础上，推测关于共同内群体的亲社会行为。

意见 5：实验 3 的自变量为国内和国外民族，因变量为金钱和时间帮助。建议作者在一个统计分析中同时考量上述自变量和因变量，如 MANOVA 分析。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将金钱和时间任务中的捐赠数值，同时纳入数据分析，进行 2(受助对象的民族类型：国内民族/国外民族) \times 2(帮助任务：金钱/时间)的 MANOVA 分析，结果显示：帮助任务的主效应显著， $F(1, 638) = 487.92, p < 0.001$ ，金钱任务中的捐赠数值($M_{\text{金钱}} = 58.03$)显著大于时间任务中的捐赠数值($M_{\text{时间}} = 31.52$)；受助对象的民族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638) = 101.90, p < 0.001$ ，国内民族成员得到的捐赠数值($M_{\text{国内}} = 50.44$)显著大于国外民族成员得到的捐赠数值($M_{\text{国外}} = 39.11$)；受助对象的民族类型与帮助任务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638) = 5.32, p = 0.02$ 。其中，帮助类型的主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时间任务的数据选择区间为 0–60min 之间的数值，金钱任务的数

据选择区间为 0–100 元之间的数值。根据实验目的，主要关注受助对象的民族类型与帮助任务的交互作用，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金钱任务下，国内民族成员得到帮助的数值($M_{\text{国内}} = 65.08$)显著高于国内民族成员得到帮助的数值($M_{\text{国外}} = 35.80$)，95%CI = [10.23, 17.96]；时间任务下，国内民族成员得到帮助的数值($M_{\text{国内}} = 50.98$)显著高于国内民族成员得到帮助的数值($M_{\text{国外}} = 27.24$)，95%CI = [6.14, 10.99]。这一结果，与文中的两个任务下分开进行 t 检验的结果一致。在文中，使用这一结果替换原本的 t 检验结果。

意见 6：实验 2 和 3 的结果发现人们对本民族有更积极的联系和更多的助人行为。这类结果已经被以往大量研究所证实。那么，本文的创新性或独特的价值体现在何处？作者已经在第一轮修改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回复。但是，以往众多研究也是涉及包摄水平较高的民族。例如，针对英吉利民族等的研究，其实探讨的是包括了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等不同民族的共同体的研究。因此，本研究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依然无法体现出来。建议作者深入思考该问题，明确指出本研究与已有研究有何异同和创新。

回应：以往有关内群体偏爱和内群体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很多，在多种社会群体内均有发现。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和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两点：

1. 群体概念的认知复杂性，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群体类型的多重性质有关。社会群体可以依赖于大范围的主观或客观标准进行划分，主要包括虚拟线索、自然线索和社会线索(佐斌 等，2019)。人为制造的组别就属于虚拟线索，性别、种族、年龄等属于自然线索，国籍、校友等属于社会线索。“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和“现代主义”(Modernism)是西方两大民族理论。按照“现代主义”观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拥有自己疆域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与“国籍”关系密切；按照“族群–象征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内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文化、记忆等的产物，与“种族”、“族群”有相通之处(王俊秀，周迎楠，裴福华，2021)。即，由国内各民族所建构的中华民族内群体，具有多重性质，它既涉及自然成分(种族、族群的限定)，也包含社会成分(国籍的界定)。对于集合型群体，较少有研究涉及，更少有研究直接考察过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这一集合型群体。

2. 实验中操纵的群体内部成分的凸显性。较多研究采用单一的、直接的群体类别来实验。比如以往关于中国群体性研究，不管是内群体偏爱还是内群体贬低的实验中，多采用“中国人”这一代称来表征(Liu et al., 2015; Ma–Kellams et al., 2011)，并未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内部的不同民族构成。然而，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性质复杂、构成多元，使用“中国人”的代称就不能在被试心中真正建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因此，本研究使用了不同民族名称或民族成员来表征共同体概念，从而真正地检验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的偏爱和亲社会行为。

参考文献:

佐斌, 温芳芳, 宋静静, 代涛涛. (2019). 社会分类的特性、维度及心理效应. *心理科学进展*, 27(1), 141–148.

王俊秀, 周迎楠, 裴福华. (2021).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民族学刊*, 12(5), 8.

Liu, X., Shan, W., & Jin, S. H. (2015). Civilised behaviour: A Chinese indigenous intergroup perception dimension.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9(2), 108–119.

Ma–Kellams, C., Spencer–Rodgers, J., & Peng, K. (2011). I am against us? Unpack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ingroup favoritism via dialectic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1), 15–27.

意见 7: 作者在回复中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丰富,但从研究角度看,还是要将其内涵具体化,具体为一些可操作和可量化的指标,容器隐喻、共同内群体偏爱、共同群体利他行为正是这样一些可操作和可量化的指标。”既然研究应该具体化、量化,论文写作也建议具体化、针对性。建议作者着眼实验本身,重新构思、修改全文的写作,使表述更加客观、具体。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按照审稿专家的意见,注重实验本身,重新构思和修改了全文的写作。

审稿人 2 意见: 该文作者针对一审意见逐条做出了详细的答复,并对正文相关部分进行了修改。审稿人对作者的答复与修改较为满意,建议发表。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经过作者的再次修改,特别是对全文表述的修改,本文质量显著提升。不过,尚有几个小问题与作者讨论,具体如下:

意见 1: 建议摘要开始部分增加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引入。

回应: 在摘要中增加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引入。

意见 2: 摘要中指出“具有丰富的跨民族交往、跨文化生活经验的内藏班高中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为具有共同感和一体意识的共同内群体”。本文并未直接验证共同感和一体意识,建议本句话的表述回归本文的三个实验本身,准确总结、合理升华研究发现。

回应：将这一表述修改为“具有丰富的跨民族交往、跨文化生活经验的内藏班高中生在共同内群体认知、共同内群体偏爱和对共同内群体成员的帮助倾向上，均展现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意见 3：前言部分在介绍容器隐喻的定义时建议借鉴并引用最原始或最经典的文献。此外，建议前言适度分段，提高论文的可读性。

回应：在介绍容器隐喻的定义时引用了最经典的文献。另外，对前言部分适度分段，增加可读性。

意见 4：前言中，作者指出“以往国内有关民族的群际态度偏差研究，大多讨论某一民族的态度发展或两个民族的态度差异，并未上升到共同体水平”。共同体如何测量呢？本研究中所测量的 Stroop 效应、启动效应和捐赠倾向能否直接测量共同体水平呢？建议作者斟酌、考量表达用语。

回应：将“并未上升到共同体水平”修改为“并未上升到包摄多民族的共同内、外群体的水平”。

意见 5： mirroneuron 应为 mirror neuron。

回应：将 mirroneuron 修改为 mirror neuron。

意见 6：建议在前言部分适当引入或介绍与本文三个实验更直接相关的内容。

回应：在前言中增加了与本文三个实验更直接的相关内容。

意见 7：作者指出“表明他们已经打破了原有的民族边界……”。本研究并未直接验证被试“打破了原有的民族边界”。是否也存在同时保留原民族界线和中华民族界线，只是在与外国人对比时，中华民族界线更明显的可能？建议作者斟酌。

回应：删掉“打破了原有的民族边界”。

意见 8：实验 2 的启动效应能否确定测量的是内隐态度？本实验的操纵可以完全排除外显态度的参与吗？建议说明相关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据。

回应：将实验 2 的相关内容修改为“群际态度”。

意见 9：实验 1 中，人名有 30 个（是判断），非人名为 15 个（否判断）。这种判断的不平衡可能会干扰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作者已经在讨论中概括性地提出了该问题，但是用语比较简洁，不利于读者理解和发现该问题。如果作者认为这是本实验的不足，建议作者在实验 1 的讨论中明确

指出该不足，以便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如果作者认为这种影响不存在，请作者明确论述相关理由和证据。

回应：首先，我们在讨论中的局限部分，专门指出了这一设计可能存在的不足。其次，实验 1 中“非人名”只是为了掩蔽实验目的加入的填充刺激，对整个实验数据的分析过程没有影响。实验 1 的目的是对出现在圈内和圈外的国内民族、国外民族两种人名判断的比较，两种人名都是“是反应”。也就是说，国内人名和国外人名之间的比较上并不存在“是反应”和“否反应”之间的比例不平衡问题。如果“是反应”试次更多导致了“是反应”按键的习惯效应，那么，两种实验条件应当受到了同样的影响。

意见 10：本研究实验 1 关注隐喻容器效应，实验 2 关注民族名称与情绪词的联系，实验 3 关注助人行为。作者虽在修改稿中提出“以内群体认知对群际态度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这一逻辑来勾连具体实验”。但是，上述 3 个实验间的关系仍然是比较松散的。例如，如果实验 2 是从情感的角度研究，为什么只关注群体偏爱呢？关注群体信任、群体距离、群体认同等“情感”是否也有必要？同理，实验 3 关注行为。那除了亲社会行为，还有合作行为、模仿行为等是否也需关注呢？建议作者进一步明确 3 个实验间的逻辑关系，特别是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回应：如前所述，从研究主题的特殊性上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迫在眉睫，但相关研究多关注理论探讨。面对这一现状，本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结合，开展实证研究。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指出，通过扩大群际边界，个体建构出包摄水平更广的“我们”群体，使内群体偏爱延伸至上位群体中先前的外部成员，并调整对先前外群体的行为(Gaertner & Dovidio, 2012)。这里，扩大的群际边界、内群体偏爱和行为作为三个关键词，指明了共同内群体认同研究的关键。按照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预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就是个体在认知上将所属民族和国内其他民族及其成员纳入一个高层级的共同内群体中，并在情感上产生对该共同内群体的偏爱，在行为上产生与内群体相关的动机和倾向。因此，本研究中，实验 1 首先验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容器隐喻的心理现实性，说明在抽象概念的认知建构上，内藏班高中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表征为处于容器内的共同内群体。按照共同内群体认知模型，共同内群体性质凸显之后，就会将内群体偏爱延申至上位“我们”群体，因此设计实验 2；在此基础上，还会产生与共同内群体相适应的行为，因此设计实验 3。3 个实验之间的逻辑，既建立在以往有关内群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研究证据上，也顺应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预测。

另外，所以没有选择情感和行为角度的其他方面(群际信任、群际合作等)开展实验，是实验设计之前我们进行选择的结果。在讨论的最后，我们补充了这一说明，后续研究可能会考虑从更多方面和其他视角出发，进一步扩充实验证据。

第四轮

编委意见：该论文经几轮审稿，审稿人对修改表示满意，建议发表。

主编意见：文章有明确的社会现实意义。又做了几次大的修改，基本达到发表要求。建议如下修改：

意见 1： 因素设计的结果解释，如果交互作用显著，应该先解释交互作用，如果交互作用显著，则进行简单主效应分析。

回应： 在每个实验的解释部分(文中的每个实验的“小结”)，先解释了显著的交互作用，再进一步解释和关注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

意见 2： 研究者在 3 个实验中，都删除了反应时在 3 个标准差之外的被试。这应该不是内隐研究范式的惯例。根据数据完整性的要求，建议作者把所有合理值都包括在内，再计算一次；如果结果没有显著变化，才可接受。

回应： 3 个实验中，均没有使用 3 个 SD 这一标准删除被试。在前 2 个实验中，使用了 3 个 SD 的标准删除了部分数据。按照专家意见，对前 2 个实验的反应时数据重新分析，将所有合理数值纳入方差分析中，得到的结果与原有结果仅仅在具体数值上有差别，在数据分析的各个比较维度(尤其是本实验中关注的交互作用和简单效应分析)上没有显著变化。实验 3 不存在这一问题，故数据分析部分未作修改。